

四百週年的光華榮景，《吉訶德》中譯版美不勝收¹

四百年前，某年某月某一天，塞萬提斯在獄中提筆寫道：「閒來無事，鬱鬱寡歡，信手拈來，下筆著書」。塞萬提斯拋棄堅硬的劍戟，改持舒軟的羽毛筆後，深諳「作家」的處境，他說文學作品是作家「孤寂的犒賞，哀愁的夥伴」。四百年後，也是承襲西班牙文學傳統風格的塞拉引述強調：「嘔心瀝血之作是在寂寞中醞釀而成」。以米蘭·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的論述反思，《吉訶德》²的寫作早在塞萬提斯忖度他人生的「輕」（閒來無事/信手拈來）與「重」（鬱鬱寡歡/下筆著書）間醞釀誕生。二〇〇五年西語世界（甚至國際文壇）慶祝《吉訶德》誕生四百週年，對應塞拉〈談寫作〉的闡述，益讓人覺得文學的永恆與影響：「小說人物的生命比作家的生命來得重要也較合邏輯。人物的生命，比作家的生命真實且持久。人物的生命比作家的生命朝氣蓬勃又高風亮節。塞萬提斯活在吉訶德中，而塞萬提斯，好多年前就死了。」

西班牙還是「日不落帝國」的黃金世紀時代，塞萬提斯曾是男兒志在四方，有役必與，企求汗馬功勞鋪建坦蕩仕途。孰料事與願違，幾次戰役身陷囹圄，《吉訶德》傳記好比他攬鏡自照的「他我」，一個恢復理性的塞萬提斯/吉訶德從「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的心境回顧那往昔不會，往後也不再的人生抱負，潛心刻畫進入「談笑間，強虜灰飛湮滅」的幻覺真理狀態的塞萬提斯/吉訶德。四個世紀以來，百工各業，多少人曾自許（詡）為「吉訶德」！那貼近「吉訶德」的心是一種嚮往、一種狂狷、一種謙卑、一種自我解嘲（解脫）、一種志業與理想（多麼繁複的理性與感性的糾葛啊！）。但「吉訶德」（塞萬提斯）絕對不是「坐而不言」的「完美主義者」。

西班牙文學的傳統是什麼？他是《吉訶德》承先啓後奠定下來的「流浪漢小說」，也是「騎士（歧視）文學」終結者（精細區隔，《吉訶德》實有多重面向：邊境文學（類似今日跨越疆界、離散主題小說）、牧人文學、騎士文學、旅行文學...等等）。《吉訶德》一六〇五年面世後，在其他國度（甚至西班牙本土）也並非喝采蜂擁、平步青雲，「他」在英、德、法不少評論中曾只是「觀其行，不聽其言」的負面評價人物。傅柯在《瘋癲與文明》裡提到，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是兩位將「瘋癲」著墨最佳的卓越典範。吉訶德因「瘋癲」流芳百世，他的「瘋癲」卻讓死亡不朽。爾今，「吉訶德」可以侃侃而談：「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呼？」西班牙人說：「初讀《吉訶德》，譏笑；再讀《吉訶德》，深思；三讀《吉訶德》，流淚。」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蔚為風尚的「旅行文學」書寫與創作，吉訶德呵呵大笑：「現代人邊旅行邊照相，我巴洛克遊俠邊旅行邊打架」。十九世

¹ 構思此文當兒，得知我的文學老師——在台任教二十年的白安茂教授（Manuel Bayo García，1940-2005）因病逝世，感念二十年來師生情誼，對我在文學上的啟蒙與教導，僅以此文向他致意，永恆懷念。

² 西文的 Don Quijote，人物與作品我以「吉訶德」逐譯。

紀寫實小說風起雲湧，俄國文學是一顆閃亮的啓明星，契訶夫把這股風潮與發皇追本溯源，歸功給塞萬提斯的《吉訶德》。幾世紀以來，文壇煜煜輝赫的小說文類及膾炙人口的人物原型（例如「雙人行、反英雄」角色）在何處？吉訶德深思：「我先知先覺，早想到旅行要結伴：談情說愛，暢談人生哲理，志同道合，一定得找個拌嘴的人腦力激盪，而不是應聲蟲。」吉訶德和桑丘唇槍舌劍般的爭論辯駁，最後合為一張說服全人類的「名嘴」（西語論壇術語稱之為「吉訶德桑丘化」，桑丘吉訶德化，兩人是彼此的「本尊和分身」）。二〇〇二年五月，諾貝爾協會和挪威書卷俱樂部邀請五十四個國家共一百位作家，請他們選出歷史上最為傑出的文學作品，出爐名單共列百部作品，塞萬提斯的《吉訶德》獨占鰲頭，成為參與篩選評定作家心目中「歷史上最佳傑作」。這個文壇或作家一向不甚認可，也不太有共識的經典傑作精選法，也無法忘卻《吉訶德》。吉訶德或許會慨嘆流淚：「大江東去，浪濤盡，我才是千古風流人物」。

歷經世紀歲月洗禮的文學經典意義應該是世世代代不斷有繼起生命（讀者與研究者）在（再）閱讀它、保存它、研究它、修復它、詮釋它，而且必須是「數大就是美」的方式圍繞它，珍藏它。廣義的西班牙語文學（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八百餘年來（中世紀迄今）因為《吉訶德》而有所謂的「塞學研究」或「塞學專家」(cervantistas)³。四千萬人口的西班牙人和近四億人口的拉丁美洲人民說：「我們說的是塞萬提斯的語言，我們讀的是塞萬提斯的文學」（誠然，拉丁美洲至少有數百種原住民語言）。近四分之一世紀來，三位西語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塞拉、帕斯）在一九九七年西語研討會中同步發聲：「我們寫的是塞萬提斯的文學」。

乍聽，彷彿是百家爭鳴，獨尊儒學般的趨勢，然而，那股心聲就像波赫士的〈波赫士與我〉提到：「好東西不屬於任何人，也不屬於作家，而是屬於語言或傳統」。《吉訶德》（以及其他語言的經典文學）都已成為人類文化共同遺產。四百年來，西語世界（讀者、學者、出版者、書市）對《吉訶德》的投入已經跨越「統計數據」的意義。西班牙語知識份子階層常言：精讀《吉訶德》就是邁向學習正統道地（包括俚俗、民情）的「西班牙語」的康莊大道。「吉訶德」的生命隨著時代思潮的蛻變，因應讀者階層的不同，因為不同地域人群對作家和學者的偏好，出版社的聲譽與投入、或配合跨藝術、跨文化的潮流推動，書寫和口語使用的變革，或研究者的解讀與學術背景（比較文學、語言學、性別研究、政治學、社會學...）...等等，時間越久遠，可以詮釋的空間越寬廣，塞萬提斯創造的「吉訶德」軀體之外，所謂的「塞學專家」前仆後繼，後浪推前浪，各種譯註、導讀，古文白話對照，改寫、兒童青少年版本，教學版本，插畫繪本...，不因既有存在的文本而停止讀者、學者與出版者的熱忱，彷彿一項產品在不同國度需有不同的代言人一般，自有他的商機與書迷。這，則不是所有文學作品可以享有的機緣福報。

³ 台大外文系退休教授沈起元神父（Fernando Mateos）、淡江大學西語系退休的田毓英教授和任職輔大西語系已故的白安茂教授則是台灣的「塞學專家」。

說學西班牙文閱讀《吉訶德》太沈重，因為，專業的偏執狂會讓我們對語言情有獨鍾，也因此挑剔。西班牙皇家語言學院院士里科（Francisco Rico）的譯注研究篇幅便是另一部《吉訶德》的厚度！《吉訶德》中文譯本的統計數據和書市的關注在中文世界則有別於西語國度本身的意義。《吉訶德》中文譯本在台灣（包括繪本、改寫、兒童青少年讀本、絕版或流通）至少二十五種，「譯者」泰半隱其姓名，僅見原作者與出版者，間接翻譯改寫居多。大陸《吉訶德》中譯，約略接觸所知，幾近「十家爭鳴」（名），且多以西文直譯（一九二〇年代有林琴南、陳家麟；三〇年代則有賀玉波、蔣瑞青、溫志達、傅東華等人。八〇年代以來，楊絳（嚴格說來，不算西文直譯）、董燕生、屠孟超、孫家孟、劉京勝等人苦心孤詣投入）。除卻原著專有名詞（地名、人名、飲食文化、俚語意涵、古西文用法）這些對文本及文化的詮釋與影響元素，兩地譯者的翻譯傳遞工夫和熱誠讓我們充滿敬意與佩服，因為我（們）都沒有勇氣去貼近《吉訶德》逐譯他。擱置語言的藩籬，台灣現有原著完整的譯本是楊絳的《堂吉訶德》，透過中文逐譯閱讀《吉訶德》別有一番盎然趣味。因為文化的異質，必然有另一番詮釋；因為中文的涵養和閱讀喜好讓讀者有了選擇評論的空間，因為翻譯之難，（難於上青天！），因此，每位譯者都有他令人驚豔的譯筆，好些個行雲流水般，毫無生硬饒舌的外語語法；同樣，也有疏忽的訛誤和自我詮釋。

楊絳譯過西班牙第一本流浪漢小說名著《小癩子》，類同技巧處理《堂吉訶德》，善用家鄉的俚語（詞彙）、嫻熟中國文學詩詞的格律韻法，轉換在翻譯上貼切優雅，也因為如此，有時語句容易生硬，彷彿順不過氣；個人的文筆造詣無庸置疑，時而還會替原著添脂抹粉。讀來譯者（楊絳）「自我實現」的挑戰大於盱衡讀者閱讀的能力與接受度，文字書寫較多琢磨，畢竟非以嫻熟的西語直接投入逐譯工作。董燕生的《堂·吉訶德》被西語媒體和大陸譯界譽（喻）為第一部「西語直譯」的《吉訶德》譯本。他標榜要以現代漢語普通話和符合當代讀者口味的譯筆再現《吉訶德》。因此，後續兩部譯本（屠孟超和孫家孟），字裡行間明顯依循董燕生的理念，譯出較順暢的口語，較少中國南北地域的不同用語。孫家孟的譯本取得達利基金會授權，將達利插畫加入譯本中，增添幾許視覺美感和以圖會文的想像空間。西文相關繪圖美不勝收，我獨愛安東尼歐·索拉（Antonio Saura）⁴黑白簡潔線條勾勒的吉訶德、桑丘與羅西納特（瘦弱的劣馬）。

雀躍的心欣見台灣讀者和「西語」《吉訶德》的「第一度」接觸，遠流出版社這部《堂吉訶德》（屠孟超譯）是另一個代言人，是二十一世紀的吉訶德先生訴說十七世紀的故事。屠孟超譯過多部西語作品，中文讀者除了西語這一道牆，仍有兩地慣用語的差異，遠流出版社的《堂吉訶德》已經降低這個語言差異。塞萬提斯在下冊的獻詞戲謔提到「中國皇帝派信使送親筆信函給他，表示急欲見（讀）《吉訶德》，因為想在中國成立一所西班牙語學院，以《吉訶德》為教本」。塞萬提斯四百年前的「預言」（寓言）在二十一世紀實現，如今不僅有讀者，還讓他的《吉訶德》像遠方來的朋友，用中文自我介紹給中文世界的友人。

⁴ 安東尼歐·索拉畫風傾向表現主義畫派，弟弟是西班牙名導演卡洛斯·索拉（Carlos Saura）。

「各家各法談翻譯」本不是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法則，身爲一個（西語）讀/學（習）者，我們需要不同的譯本讓我們領略不同譯者對《吉訶德》的瞭解層次，更需要不同的譯筆讓我們選擇接觸我們可以（也願意）貼近的「吉訶德」。也讓不同譯筆呈現中文之美，反映西語之妙。讓《吉訶德》四百週年的紀念在中文世界也像是個「眾神的花園」，有琳瑯滿目的中文《吉訶德》齊聚的奧林帕斯神殿！

2005年3月14日